

尼克松的政治画像

白 宫 记 者

(美) 威廉·科斯特洛著

(大学教学参考读物)

复 旦 大 学

一 九 七 二 年 一 月

目 录

作者前言·····	.. (1—4)
第一部分 候选人	(5—42)
第 一 章 一九六〇年和以后	(7)
第 二 章 一九四六年和以前	(24)
第二部分 竞选者	(43—210)
第 三 章 政治生涯的开始	(45)
第 四 章 乔蒂纳式的训练	(50)
第 五 章 沃勒斯和一九四六年	(58)
第 六 章 一九五〇年的道格拉斯夫人	(70)
第 七 章 全国代表大会前的竞选运动	(88)
第 八 章 怎样成为副总统候选人?	(99)
第 九 章 “秘密基金”事件	(112)
第 十 章 首次退潮时期：一九五四年	(144)
第十一章 总统心脏病引起的危机	(164)
第十二章 “倒尼”阴谋	(171)
第十三章 <u>与艾克在一起的一九五六年</u>	(184)

第十四章	一九五八年的卡奴特王	(198)
第三部分	公仆	(211—304)
第十五章	众议员	(213)
第十六章	参议员	(240)
第十七章	副总统	(269)
第十八章	环球的旅行者	(287)
第四部分	政治家	(305—338)
第十九章	活动家	(307)
第二十章	道德家	(327)
尼克松年表		(339—346)

前 言

本书写作过程中，初稿写出时只略胜于一堆罗列的事实，稍后则有如一长篇侧面描写。继续写下去时，随着文献的增多，某些方面稍见充实；因缺乏一个更适当的名词，作者姑且称它为传记，这是应当请读者郑重注意的。

我的任务只是收罗事实，让材料本身来说明问题。我很不赞成马凯萨·艾里斯·奥里戈所说的传记三个引人入胜的秘诀，即文饰、虚构和评鉴。我还是相信约翰逊博士那一句被历代传记家当作最后依据的名言：“我们无法见到人的内心，但他们的行动是可以观察的。”

这种旧的说法所没有提示的，而我在一连好几个月的研究中已经明显地体会到了，这就是说，对理查德·尼克松的“材料”作最周密的、苦心的探究，要是拒不接触他的私人文件，那尼克松作为一个相当全面的、立体的人的形象，还是表现不出来的。

我之所以提出这一点，是因为政治就是装姿态、演戏、讲究表情、斟酌字句，所有这些都是材料的一部分，但未必是这个人的实质部分。主要的事实是公众看不到的，这些事实是在他那些推心置腹的信件中，在匆匆写的便条和发出的电报里，在大会的议事录和他的日记及流水簿里，或者在他和所信赖的朋友的通信里。在人们的活动中，那些能观察得到的不全是真情，甚至连大部分都还不是。这对一个政治生涯尚在半途的政治人物来说，尤其是这样。

由于这个原因，一种根据构成尼克松这个政治人物的事实而写的著作，就变成某种政治方面的纪事；而就一般意义来说，还

不能真正说是一本传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一个风云人物的冲动和感情，是极少表露出来的。他的动机是不可捉摸的，他的小过失和私愤是隐藏起来的。在这样的时代，人们把人的行为列成若干类型，并用冷眼来对待这些行为的效果。如以为这种外部表现可以作为对一个人的实质性的衡量，那就未免太幼稚了。

既然如此，那只有回头遵循约翰逊博士的信条，没有其他可以选择的了。厄尔·梅佐为了完成他对副总统的生动而权威性的描写，曾和尼克松会见几次，还看到一些不公开的文件，作为他周密探究材料的补充。我却得不到这样的合作；也许因为尼克松想当总统的野心未能实现，我想和他会见的这个期望就是不现实的了。为了寻找一个机会来测验我上述推测是否正确，我曾于一九五九年二月五日冒昧地写了一封信给他，陈述自己的打算，还说：

“当然，为了力求正确，如果下一个月或差不多的时候，您能腾出一两小时来同我谈话，那将是极有帮助的。要是您觉得您的日程排得太挤的话，那我也不想强求。”

此后，我同他的交际秘书作了几次恳切的电话交谈，但对我的请求没有给予书面通知；而且，到七个月之后全书已经脱稿的时候，仍然没有能安排一次会见。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记录材料的研究来表述他这个人物时，我认为不宜把这本书写成纯粹的年谱，也不宜把它写成过分戏剧化的故事集，而应当明白地把尼克松当作一个有特殊才能的竞选者来写。因而这本书特别把重点放在第二部分，将他的其它部分的经历围绕着这个中心来写。

本书所依据的公开材料，一般可归为三类：《国会记录》、尼克松的讲演稿和当时的新闻纪事；而很少以他同辈人的回忆和偏见为根据。这里特别要提出致谢的，当然是《纽约时报》这家大报馆，它的华盛顿编辑部主任、卓越的詹姆斯·赖斯顿以及他手下专心研究当代政治史的作者们。

其他人士的报导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可列出一张相当长的著名作者的名单。除了正文中分别提名的以外，我特别得到下列诸位的帮助，即约翰·T·亚历山大、拉塞尔·贝克、詹姆斯·巴西特、威廉·M·布莱尔、威廉·E·博恩、约翰·F·布里奇、艾伯特·克拉克、莱斯利·克莱普尔、查尔斯·B·克利夫兰、威廉·R·康克林、劳伦斯·E·戴维斯、威拉德·爱德华兹、劳伦斯·C·埃克龙、西德尼·菲尔兹、菲利普·盖林、克莱·高兰、丹·格林、罗伯特·T·哈特曼、马丁·S·海登、格拉德温·希尔、加尼特·D·霍纳、卡罗尔·基尔帕特里克、威廉·奈顿、克莱顿·诺尔斯、威廉·H·劳伦斯、保罗·R·利奇、约瑟夫·A·洛夫图斯、默里·马德、詹姆斯·Y·牛顿、克罗斯比·诺伊斯、弗农·奥赖利、菲利普·波特、赫伯特·菲尔布里克、阿德拉·罗杰斯、圣约翰、杰克·斯蒂尔、莱斯特·坦泽、赫伯特·特拉斯克、詹姆斯·沃纳、查尔斯·惠普尔、海伦·沃特豪斯。还曾得到几位专栏作家的帮助，即约瑟夫·艾尔索普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马奎斯·蔡尔兹、彼得·埃得森、多丽丝·弗利森、戴维·劳伦斯、乔治·E·索科爾斯基、威廉·S·怀特和已故的托姆·斯托克斯；当然其中首要的是沃尔特·李普曼。

前人所作有关副总统的著作也应一提，如拉尔夫·德·托勒丹诺和詹姆斯·基奥所作的，特别是厄尔·梅佐所作的；还有罗伯特·J·多诺万、威廉·弗林、威廉·V·申农以及理查德·罗弗对这方面文献所作的，都是有价值的贡献。

我必须向《新共和》的编者兼发行人吉尔伯特·A·哈里森表示感谢，向维金书店的查尔斯·博尔特及其他几位表示感谢，他们向我提出写这本书的计划，并给予完成的方便；我也感谢我的妻子，她利用教学工作的余暇协助我修改原稿；感谢副总统的幕僚洛伊·冈特，他提供的有关副总统的讲演辞以及其他资料，

对我帮助很多；还要感谢我的研究助理埃德娜·伊万斯和安·多伊尔，她们在资料工作方面的忠诚和不辞辛劳，使本书内容得以确切而充实。

书中如有主观的看法，如有疏漏、谬误或不恰当的推断，那完全是我的责任。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五日于美国首都

第一部分

候 选 人

原书空白页

第 一 章

一九六〇年和以后

“一个拘谨的、近乎自卑的副总统尼克松站在圣保罗大教堂里。”《伦敦新闻纪事报》这样记载，描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场面，在大教堂附属的美国礼拜堂的献堂仪式中，他作为总统的代表严肃地站在伊丽莎白女王旁边。

《伦敦新闻纪事报》接下去写道：“人们从副总统镇静的外表可以看出这个乡下孩子的惶悚心情，他在这样短短的岁月中达到了这样的高位。”

上述动人的一笔，也许不是那么有礼貌；而在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这种音响倒也听得习以为常了。

尼克松的政治经历，从开始起就在狂风暴雨中取得进展。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把自己和二十世纪的带有革命形式的大众人混同起来。作为他这时代的代言人，他想入非非地以为可以同时左右开弓。作为一个需要对付很多角逐者的兜售商，他是一个花样很多的人。

他专心致志于政治，从未片刻松懈和脱离过。在十四年中他使自己成为一个世界性矛盾的象征。

在他看来，他是否将走上美国生活中更显贵的地位，主要不是依靠他能为改变时代的形式做些什么，而是凭他如何对时代适应的能力。在他反抗贵族政治——这种反抗在他这一代中经常出

现——的过程中，他声言已把个人的命运置之度外。他自称为一个“政治上的宿命论者”。在他的哲学中，人不是造时势的，相反，人是时势所造的。

他说：“政治地位常来找我，因为我人在，而且时间和地点的条件恰好适合。……这完全要看机会怎样了。”

这种宿命论往往被人忽略了，而就他的性格说，这倒是基本的。这就是把看来无动于衷的超然气氛或冷漠感觉渗入他的整个性格中。与此同时，却又出现了各种相反的形象；这些形象随着他每一次新的权力的获得和政治地位的提高，而日益发展。

在一方面，他是认真的、高尚的、新进的政府长官。他是廉洁和“诚恳的”，他极想得到人们的好感。他示人以无可非议的个人生活。他惯用的姿态很能讨人喜欢。在政治家前面他严肃而谦恭。在大学讲演时，他抱着认真和追根究底的态度。在社交场合他是一个谈应酬话的好手。

他是“少壮的保守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他严肃地按照议事日程主持会议。他是上窜下跳的活动家，他极想精心制定一个法案，或得出一个折衷方案。他是进步方面的朋友，对他们寄以某种希望。他是共产主义的敌人，带着相当激愤的卫道语调。他有一种平易近人的特点，谈问题时不厌其烦，说话娓娓动人。他微笑时，只是为了不使对方感到局促不安，而未必反映他的真情实感。

艾森豪威尔总统曾称他为“我的班子中最可贵的成员”。

在另一方面，尼克松被认为既是和霭可亲又是冷酷无情的党人的样板。不管他的动机或方法怎样，他是可怀疑的。对待他的敌人，他是不讲原则的，他是不讲信义的，他是诡计多端的。他没有多大幽默感。他的性情是喜怒无常而不稳定的。不管他的主张如何激烈，他的攻击如何凶猛，他总保持一种冷淡、刚愎、不动情的镇静态度。他把讽刺和控诉混在一起，对罪恶仅示慨叹而

不痛恨，而且还许了这样的愿：凡投共和党票的人都可得救。对一些人，他象持斧钺的人，面孔铁板无表情。对另外一些人，他象“纸牌上的人”，只有两头而无躯体。象兜售商威利·洛曼一样，他穿着一双发亮的皮鞋装着一副笑脸到处走动。

有一个在一九五二年拥护他的著名共和党人说：“他究竟是否有信念或决断，这倒是一个问题。”

他对待群众有一套新的理论。他深懂左右群众的一套诀窍，善于巧妙地利用宣传工具，把问题加以简单化并告诉群众，“造成冠冕堂皇的戏剧幻觉”。他作为一个身居高位的人，想告诉人当前的问题根本很简单，只要用浅显易懂的名词加以解释——这在他是能够做到的——每个头脑清醒的人就能看出他的明显的答案。这样他便把复杂的问题马上化为那种用单音词“对”或“错”来解答的问题了。

他有一种本领，能利用必然发生的事情，能掌握主动，能拉拢下了台的人，能不使自己陷于两面为难的地位。他被看作是一个政治上与众不同的人，因为那些同辈的、前途有希望的政治家都是民主党人。

用尼克松自己的话来判断，他内在的我仍然是一个谜；在人面前公开出现时，他是一个清瘦、干净、周身经过修整的形象。在他描绘自己的时候，他要使人产生这样的想法，他的感情结构与他的同僚们根本不同，他能够以坚定的意志将愤怒的冲动克制住，有如把瓶子塞住一样，只有在环境需要，即为造成政治效果的时候，才把瓶塞拔掉。

拉尔夫·德·特勒丹诺首先透露，他说尼克松从经验中得出的一条规律是：“……在政治中只有当故意做作的时候才发怒。在政治中你所能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发怒。”同样地，谈到在利马和加拉加斯发生骚动他差一点丧命的时候，尼克松对罗伯特·T·哈特曼说，他并未发怒——“因为他决不允许怒气占上风，

他应付环境的秘诀是，当情况变得非常棘手时，他得进行分析和保持冷静。”

当圣马尔科事件^①发生之后，尼克松解释道：“我并未动怒，当其他人发怒的时候，我有意抑制住怒气。”

副总统在斯图尔德·艾尔索普面前，重新描绘他在拉丁美洲时的狼狈感受，又说了同样的一番话。

他说：“我对压力的反应，……是故意延宕，当压力继续下去时，我头脑冷静，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在利马……当我看到软的回答不起作用，他们不让我说话时，我就让自己任性发作，称他们为胆小鬼。这是有意让我的性情表现。等到象这样的危机过去后，我就感到大大地轻松了。……好象经历了一场战斗。”

如果他周围的那些人有时觉得他冷淡、疏远、敷衍、眼光和他的面部表情不配合，这是由于他超然离群的习惯，他对这种习惯的辩解是，在某种场合它为策略上所必需。

他说：“……即使你正在同人家握手的时候，在应酬的时候，你必须经常想心事。我长久以来养成了一种在做一件事的时候想另一件事的本领。”

我们考察尼克松操纵自己感情的本领，有一个最可靠的来历，就是回溯到他在惠蒂尔学院当学生的时候，当时他热衷于参加业余演剧。在一个剧本中，理查德扮演一个丧偶的客栈老板。在进行预演中，当剧情进入高潮，全场看他一人表演的时刻，理查德怎么样也表演不出那老嫖夫的悲痛情绪，这时导演艾伯特·厄普顿博士挽回了这个场面。

他说：“迪克，集中地想那种真正的苦境，好象真有一大块东西梗在你喉咙里似地，我想你就会哭出真正的眼泪来。”

^① 见本书第十八章。（本书脚注中除作者注加以注明外，其余未注明者，皆为译者注。）

迪克照此练习，等到他真正掌握了这个诀窍，到最后上演时，泪水便象耍魔术一样地涌出来了。后来厄普顿博士在一九五二年看到一张照片，镜头是尼克松在“开支基金”危机^①圆满收场时靠在参议员诺兰的肩上哭，这时厄普顿回忆了那件旧事急忙补充说：“你可要注意，迪克从不作假，他确有这样的心情。”

在几次竞选运动中，尼克松自夸在群众前面手段高明。不过有一次在加利福尼亚州，他在猛烈的激动下再也忍耐不住了。当一个叫嚣特别厉害、讨人厌的质问者威胁着要破坏那次集会的时候，尼克松最后转向着他，一反平时那种雍容雅度，用粗俗的话把那个人痛骂了一顿；然后气冲冲地叫道：“在我们当选的时候，我们会对付象你这样的人！好吧，小伙子们，把他撵出去！”

象这样的情况是少有的。至于尼克松内心深处究竟郁积着怎么样的愤激烈火或反抗情绪，那只好加以揣测了。据威廉·S·怀特的推测，副总统的自我克制包含着很大的持续力。

尼克松赢得了一个顽强的政争老手和幕后策划者的称号。作为一个党人，他曾被比之于杜鲁门。象那个前任总统一样，在党派利益问题上，“他无所不用其极——他是走极端的”。

他有些做得过火的地方得到朋友们的谅解，说是因为他有政治野心。参议员罗伯特·A·塔夫脱作为一个公职人员，并未因有政治野心而昧了良心，他是反对上述辩解的一个人。在一九五二年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塔夫脱同一个朋友和支持者约瑟夫·波洛夫斯基谈到尼克松时，很遗憾地说尼克松是“一个大忙中的小人物”，指出他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有一种“卑劣的报复心理”，并且把他的人格概括为一个倾向“扩大紧张和冲突”的人。这个参议员表示了这样的强烈看法：环境决不会允许尼克松登上总统

^① “开支基金”危机或“开支基金”事件，是指尼克松在竞选中受到政敌攻击一事，有人说垄断资本家捐助给他的竞选基金是一种变相的贿赂，但尼克松否认这是受贿。

的宝座。

另外一个著名的美国人不赞成把尼克松描绘成一个守分的、象海狸那样忙个不停的人，这就是议长萨姆·雷伯恩。在众议院四十七年间，雷伯恩遵循着一个规矩，就是从来不说议员们的坏话，但对尼克松他却打破了这个规矩。在一九五四年副总统同人争论叛国问题后，雷伯恩愤懑地说：“在我看来，他的名字是肮脏的。”在他偶而讲得厉害的一次，他对他的知己朋友说，在他所共事过的国会议员数千人中，尼克松有一张“最凶狠的脸”。

尼克松作为党人所表现的目光浅短，没有比他一九五六年在纽约林肯纪念日讲演中更好的例子了。为了哗众取宠，他夸口共和党在促进人权方面作出了成绩，在独白将完时他得意洋洋地宣布说：“一个伟大的共和党人首席法官厄尔·沃伦代表最高法院的意见，已经下令在全国学校中停止种族隔离。”

政客们和编者听了都大为吃惊，群情愤慨，纷纷起来指责，认为法院是超党派的。《纽约时报》宣称把共和党 and 最高法院并列起来，这是“对首席法官的重大污蔑”。斯克里普斯—霍华德系的《华盛顿每日新闻》向尼克松提出指责，说他“以出奇的论调把最高法院拖到政治小路上去。……这是不确当的，不必要的，也是不可原谅的”。其他方面则声言，副总统越出了“一切正当的界限”，他的吹嘘过了头，“将党派的气味浸染到整个司法部门，从而降低了司法的尊严”。

谴责得最严厉的是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他在讨论艾森豪威尔的健康和设想尼克松作为一个可能的继任人的资格时，他向读者说：“一般国民有权期望一个美国总统能保持一定的道德考虑，但是他这个人连这样的最高法院的决定都想利用来达到党派的目的，那么他的良心也就根本不存在了。”

面对着这种不满，尼克松一再表现出持久的忍耐。当他未能以冷酷、生硬与潜在的勇气突破困难时，他只得在沉默中求庇

护，而不象他在一九五二年“开支基金”事件达到高潮的“切克斯演说”^①中所做的那样。他缺少焕发的才气，而以坚韧来弥补。

二

在追求政治前途的紧要关头的斗争中，年方四十七岁的副总统，必须估计到一连串重大的、难以捉摸的因素，有些是本来就存在的，有些是他自己造成的。有这么一些问题存在着，比如：一九六〇年的选举票数怎样，这怎样能和他政策上所争论的问题联系起来？一股失败论的暗流威胁到他的候选提名，有什么办法可以将它冲淡？怎样能够保持他在党组织中的地位不受损害，同时又能动员广大群众来支持？牵涉到他个人与共和党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当前的一些问题时，他和共和党究竟站在什么哲学立场上？

在他担任副总统的年头，尼克松在党的一些高级委员会中已取得了无与伦比的地位，这不仅在正式的党组织内的等次上是如此，就是在政治舞台外的那些巨头们中间也是如此。他在最初作为一个穷人时，曾劝其他穷人在利益上和他站在一起。他显示出一种平易谈论和不事夸张的本领。他的成功使他在选区中获得一种实力基础，不期而然地使他挤入富人的上层人物中，而且很自然地不需多久他的新的地位就得到真正的显贵们的承认。不过他青云直上这一事实，本身意味着他置身于一场危险的意识形态的交叉攻击中。

① “切克斯演说”和“开支基金”事件有关。它是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尼克松所作的一次电视广播演说。这次演说由共和党安排，目的是给尼克松一个在群众面前进行辩白的机会。尼克松在演说中表示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从无受贿和假公济私的行为；他说他一生只收受过一件礼物，这就是他家里一条名叫“切克斯”的小狗，这小狗也是人家送给他女儿的。那次演说扭转了尼克松的困境，因而人们称它为“切克斯演说”。详见本书第九章。

共和党的右翼和左翼之间，在争取全国选票的战略问题上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冲突。按塔夫脱的方案，要赢得选举，必须充分动员保守派投票，而这派早就被共和党候选人中的“新政”^①派所谢绝。另一方面，按党内前进分子的主张，只有从民主党人和“独立”派中吸取广泛的选票，共和党才有希望取得全国性的多数。艾森豪威尔是持后一种主张的、新的共和党代言人而进入白宫的，但当他连任总统做到中途的时候，他让党内的保守派在国会中居领导地位，自己也以他们的基本态度为转移。

尼克松怎样抉择是关系重大的，他从两个假定出发。首先，一九六〇年的总统人选，不管南部态度怎样，这都无关大局；北部民主党中一部分重要的人可能转到共和党方面来，问题是：哪部分人呢？

其次，共和党中的自由派很想得到他们精神上的同道。他们提出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六年成功的公式——就是说，一个候选人要得人心，就必须实现充分的公民权利、社会保险制度和劳工政策。保守派的意见赞成厉行精简节约，预备拟订一种投合中等工业资产阶级和经济比较宽裕的工人所盼望的财政政策，这些人在通货膨胀中有可能遭受最大的损失。提出后一种方案的人希望加深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用集结保守派选票的办法使共和党成为一个多数党。自由派的人则认为，在共产党煽动人民群众起来和全世界人口激增的时代，这种希望是会落空的。

尼克松的态度是富于弹性的。为了寻求一种可行的方案，他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日发表的一篇讲演中，就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那时他还是一个众议员。

他说：“共和党所处的地位一直被看成是大企业和既得利益

① 一九三三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执政后为挽救当时资本主义的严重的经济危机而采取的施政纲领。但因其中某些措施同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眼前利益有抵触，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美国最高法院先后宣布许多重要的“新政”立法为违宪。